

新 / 闻 / 传 / 播 / 学 / 丛 / 书

■ 主 编 ■ 李 珮 ■

疫病防治与 健康传播

重庆的天花灭绝实践
(1891-1952)

刘 娟/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新 / 闻 / 传 / 播 / 学 / 丛 / 书

■ 主 编 ■ 李 珮 ■

疫病防治与 健康传播

重庆的天花灭绝实践
(1891-1952)

刘 娟/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疫病防治与健康传播: 重庆的天花灭绝实践 (1891—1952) / 刘娟著.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5. 10
(新闻传播学丛书)
ISBN 978-7-5657-1486-3

- I. ①疫…
- II. ①刘…
- III. ①天花—卫生防疫—经验—重庆市—1891~1952
- IV. ①R51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6459 号

新闻传播学丛书

疫病防治与健康传播: 重庆的天花灭绝实践 (1891—1952)

YIBING FANGZHI YU JIANKANG CHUANBO: CHONGQING DE TIANHUA MIEJUE SHIJIAN
(1891—1952)

著 者 刘 娟
策 划 编 辑 姜颖昶 司马兰
责 任 编 辑 姜颖昶 司马兰
装 帧 设 计 拓美设计
排 版 楠竹文化
责 任 印 制 曹 辉
出 版 人 王巧林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 100024
电 话 010-64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 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0.75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1486-3/R·1486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编 委 会

主 任：李希光 欧阳宏生

编 委：李希光 欧阳宏生 李 珮 罗小萍

李 韧 蒙晓阳 贺 艳 王 炬

陈笑春 裴永刚 屈永刚 赵文丹

主 编：李 珮

副主编：李 韧 罗小萍

本成果受“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博士项目”资金资助
项目批准号：2014BS092

总 序

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是重庆市第一所经教育部正式批准建设的新闻学院，筹建于 1994 年，1995 年开始面向全国招生。

学院在办学之初提出了“主新辅法”的培养模式，形成新闻学和法学相结合的独特学科交叉优势，并整合了法学、哲学、文学、管理学等学科资源，形成“媒介视野、法律正义、社会责任”三者并重的办学特色。

学院 2010 年更名为“全球新闻与传播学院”，这是学院保持发展法制新闻特色办学 15 年之后的一次理性拓展，力求充分整合国际国内优势资源，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新闻与传播人才。

2015 年是学院成立二十周年，为总结我院办学经验，醇化学术氛围，提升学术影响力，从 2014 年起，我院陆续向社会呈献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系列丛书”。

第一套丛书共 11 部作品，已经于 2014 年 5 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这 11 部作品分别为：《新闻侵害人格权研究》（蒙晓阳教授著）、《中国电视娱乐文化批评》（李林容教授著）、《法律的电视虚构生产——中国当代法律题材电视剧研究》（陈笑春教授著）、《1903 年：上海苏报案与清末司法转型》（蔡斐副教授著）、《中国出版物版权输出竞争策略研究》（裴永刚副教授著）、《媒体是信任危机的帮凶吗？》（郭晓科副教授著）、《关于“家”的想象与叙述：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家庭伦理电视剧的叙事文化研究》（贺艳副教授著）、《三峡工程纪实影像传播史》（郑微波副教授著）、《重庆都市报发展史》（赵文丹副教授著）、讲师所著的《关注热点：特定议题新闻报道研究》（陈丽丹副教授著）、《地理影响与文化表征——重庆电视纪录片研究》（周松博士著）。

这 11 部作品分别代表了该院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在新闻与法治研究、国际新闻研究、影视与新媒体研究、政治传播研究等四个研究方向的代表性成果，也是我

院新生代学术实力的一次整体亮相。

即将面世的这套丛书共 15 本,是我院面向社会推出的第二套丛书。该套丛书的作者主要以我院的青年博士为主,也是我院青年教师在新闻与法治研究、国际新闻研究、影视与新媒体研究、政治传播研究等四个研究方向所取得的最新成果。

李珮教授等所著的《网络环境下突发事件传播与管理研究》,旨在通过对我国网络环境下突发事件案例的剖解、反思,以及引入政治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从系统论视角出发,勾勒突发事件在网络环境下的“异化”以及不同诉求传播主体间的博弈、妥协与共谋。根据网络环境下突发性事件发展的新形势,提出“网络舆情事件”的概念,并据此指出相应管理制度的缺失和法制建设的盲区。在此基础上,深度思辨突发事件政府应急管理陷入的误区,并尝试在“中国特色”框架之下给出网络环境下加强突发事件管理的对策建议。

陈笑春教授所著的《影视作品里的中国法治》,主要以法治题材的电影电视作品探讨了虚构的影视作品对于现实法治进程的再现及其社会语境。该书以法治题材影视作品发展的滥觞、发轫、兴起、多元和转型这五个时期为分野,每一个部分中选取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影视作品进行具体分析。影视作品对个体生活的再现,令法治领域与其他社会领域之间的关系在微观故事中变得具体而多样,诠释了法治内涵的现实性和丰富性。

贺艳副教授所著的《媒介表征与城市形象:以重庆为例》以重庆为研究个案,从较为宽泛的媒介界定出发,试图探讨以下问题:在文学作品、报纸、电视、电影、网络等多种媒介所传播的内容之中,重庆呈现为怎样的形象?重庆的这些形象又是怎样被建构的?媒介所呈现的重庆形象还存在着哪些问题?

蔡斐副教授所著的《戈公振新闻思想研究》,以中国新闻传播史奠基人戈公振先生为研究对象,以历史的眼光和翔实的史料剖析了戈公振新闻本位、新闻法制、新闻教育、自由主义、新闻编辑、媒体经管等新闻思想的各个维度,全面展示了戈公振新闻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时代特征。

谷李副教授所著的 *Intellectual Constellations (1980—2008): Four Essays*,提出文学、电影文本和文化经济政策及其讨论、批评作为知识分子聚集并集中表达和建构自身与世界关系的场域。通过对上世纪 80 年代初到 21 世纪初的个案分析,该书勾勒出一一种可称之为后社会主义情感结构的现象的一些侧面。

杨婷副教授所著的 *Effects of SNS Uses o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ocializa-*

tion: Focusing on Chinese Students In Korea, 研究了在韩中国留学生的社会化状况。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定量研究阶段, 通过自填式问卷调查, 对社会化结果(包括学习动机、社会融入程度等六个变量)以及社交媒体的使用对于各个变量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调查; 在第二个阶段, 运用深层访问法, 分三个阶段(期盼阶段、遭遇阶段、习得与改变阶段)对被访者的社会化状况进行了分析。

刘娟副教授所著的《疫病防治与健康传播: 重庆的天花灭绝实践(1891—1952)》, 在挖掘大量民国时期原始材料的基础上, 从阶级基础、社会组织、文化建构及行为模式等方面, 以19世纪以来天花防治为背景, 截取重庆开埠直至宣告天花灭绝为时间切片(1891—1952), 描述牛痘接种的信息从传播到扩散, 最终改变民众防疫行为的过程。本研究的价值在于以历史的视角拓展了“创新扩散理论”在健康传播中的运用, 认为阶级基础是重庆乃至全国在新中国成后迅速扑灭以天花为代表的烈性传染病的重要原因, 以期为当下疫病防控提供本土经验。

屈永刚博士所著的《儒家政治正当性观念发展研究——从孔子到董仲舒》, 以西汉初期之前儒家政治正当性观念为研究对象, 以孔、孟、荀正当性观念为基点, 上溯殷周时期, 下及西汉初期(以董仲舒为代表), 对西汉初期以前儒家政治正当性观念的渊源和发展作出了系统的梳理。

赵莹博士所著的《我国民间商事借贷立法研究》, 基于民间借贷的商法属性探讨其立法体系的构建, 认为在我国应建立规范民间商事借贷的统一立法。

刘大明博士所著的《宋代新闻传播与政治文化研究》, 主要介绍了近代中国新闻教育史发展的某些规律和特征, 重点阐述了北洋政府时期新闻教育事业的发轫、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时期、抗战时期战时新闻教育事业和两极问鼎时期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状况。

申可君博士所著的《城市社区居民参与机制研究》, 试图通过分析居民参与要素的新特点, 构建一套有效促进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六个二级参与机制, 并剖析该机制的形成、分类及其影响因素。同时, 提出推动居民参与机制运行的保障条件, 以期能助力基层政府摆脱长久以来居民参与不足的困境。

廖宇翊博士所著的《大众传媒对城乡统筹发展的作用研究》从经济学、管理学和传播学相结合的新角度研究了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统筹发展的问题,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了知识和信息在城乡之间的不均衡分布是城乡差异的基本原因, 提出了缩小城乡差异的新途径是改变知识和信息在城乡之间的供需失衡状态。

刘必华博士所著的《转型社会中的大众传媒与公共利益》提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与矛盾冲突的尖锐性，要求建立以公共利益为基本取向的传媒体系。该书从体制、话语与实践三个层面考察了中国传媒服务于公共利益的表现，并从传媒治理、职业道德和受众参与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任正安讲师所著的《走出现代的尴尬——边缘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传播的土家族样本》观察了在新传播环境下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沟通与媒介使用现状与变迁，将文化传播和媒介教育相结合，以少数民族媒介素养教育为出发点，探讨如何更好地在少数民族集中的西南地区提升媒介教育，进而提高其媒介素养，传播本民族文化，以对传受双方及其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多元互动的高度重视探索传播效果的有效提升。

徐金讲师所著的《解码与编码——广告创意实务》旨在运用符号学和结构学视角对经典广告进行分解，寻找出独特可行的广告创作思路，总结出广告思维及创作规律，并通过广告创作实例展示广告创意及创作方法的运用。

这套丛书集中体现了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的传承和创新，也是我院新生代学术实力的再一次整体亮相。

甲戌年间建经纬，荏苒岁月二十载。

日钟两江之灵秀，月沐法府之鸿光。

法治新闻创特色，全球视野开新章。

心系天下得清誉，五湖九州望徜徉。

我们真诚地期待着学术界对我院新闻传播学系列丛书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是为序。

李珮

2015年12月于毓秀园

序

本书作者刘娟博士作为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青年教师，于2014年在清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这部著作即在其学位论文基础上成稿。由于她身兼教职，在读期间我们交往无多，只在论文阶段参与其开题、中期检查、论文答辩等环节。起初，她同其他学生一样，进入学科前沿两眼一抹黑，如同新兵进入实战难免手足无措，但不久，她就显示出良好的学术资质与研究禀赋。做学问先得坐板凳，她不仅在图书馆、档案室老实地坐了很长时间的冷板凳，查阅大量一手文献资料，而且许多资料都是一页一页手抄的。她说道：“以前从来没做过历史研究，对档案查阅整理的知识几乎为零。第一次走进重庆市档案馆，调出民国时期的卷宗，整个人都傻了。习惯了电子化的规范文件，对当时笔迹各异的档案，不要说找到逻辑，就是把那些字都认出来，对我来说都是一大难题。于是我每天白天在档案馆找资料，晚上回家之后再一字一句地把它们辨认抄录出来。”

这篇学位论文是以健康传播的理论为视角，研究重庆近代开埠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即1891年至1952年，天花的防治与灭绝问题，包括种牛痘等信息如何传播。民国年间的烈性疫病有十三种之多，致死率最高的为鼠疫、霍乱和天花。如今，天花早已灭绝；而在旧中国，天花却是一种常见病，居高不下的儿童死亡率也与此有关。现在，种牛痘、防天花的常识家喻户晓，从城市到农村，从内地到边疆，适龄儿童都有种牛痘的经历。而新中国成立前，仅在重庆就可以看到，种牛痘有多么费劲，“健康传播”又多么难以奏效。为此，刘娟选择了这一研究课题。记得中期检查时，虽然论文八字才有一撇，但她的侃侃陈述以及丰富翔实的资料、渐渐清晰的思路等，已让大家看到了一项有价值成果的研究雏形。

当然，好事多磨，高水平研究更不可能一帆风顺。比如，由于不良学风的潜在影响，尽管她的论文资料、相关背景以及前期研究包括数据统计等，都已非常明确

地显露一个事实：清末民国忙活半个多世纪也未消灭的天花，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迅速终结。但她的初稿不仅止步于这一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还生搬硬套一些舶来理论，致使结论曾显得不伦不类、莫名其妙。而一旦解放思想，突破束缚头脑的条条框框，认真直面历史事实及其逻辑关系，探究其来龙去脉与前因后果，那么所谓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学术思想以及传播理论也就水到渠成了。

现在，这篇学位论文经过一年多的修订终于付梓，我为这一独创性成果感到欣慰。在我看来，这篇论文弥足珍贵的地方，是一种我们致力倡导的治学精神与科学态度：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洋，只唯实。其中，我印象尤深的是，论文通过步步为营的考察，得出令人深思的结论：旧中国半个多世纪未能解决的传染病防控，更不用说根治问题，新中国短短几年就彻底实现了；其中除了各种主客观条件，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两种世道，两种路径；旧中国尊奉精英路线，新中国实行群众路线。而后一种“健康传播”的路径，如同我们熟悉的人民战争方略，不仅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自由，而且也通过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宣传教育以及数十倍增加的接种疫苗人数，一举解决了天花等传染病的防控难题。这个结论看似寻常，不如专业主义、公共领域等新潮学理听起来高上大，但深究起来却耐人寻味。比如，什么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的社会历史意味何在？2014年，修远基金会的一份研究报告《群众路线：人民民主的当代实践形式》写道：

群众路线作为一种中国共产党宝贵的历史资源，其理论和实践意义，仍有待深度发掘。

群众路线的要旨，在于它是一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互循环的动态政治过程。

在城市革命遭受挫折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员接受中央指派，进入广大农村地区发动群众运动。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先进的理论并不能吸引农民，党员必须把这些理论本土化、在地化、物质化，用“土地、大米、馒头”讲清楚何为剥削，讲清楚为什么要反抗……

党员为了能指导农会工作，要保持权威，就得注重农民的诉求，改变作为知识分子常有的教条主义的工作作风，更注重中国现实。

这种“星火燎原”的工作模式，成本低、见效快，并且使得中央与基层的沟通更为畅通、有效，这可以说是一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群众成为政治的参与者，而党也成为大众政治的一部分，它们相互塑造，水乳交融。（《文化纵横》2014年第六期）

刘娟的新作也为上述理论概括提供了一个新的鲜活案例，而诸如此类的案例以及反面案例，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年代俯拾皆是。至于为什么是群众路线而不是其他路线，说到底还是为什么人的问题。就在草拟这篇拙序时，看到凤凰卫视出版中心主笔玛雅博士的访谈《国家治理能力视野下的医改困局——访北京大学中国健康研究中心主任李玲》。访谈从两个医改人物及其命运谈起，一个是由于安徽宿迁模式而步步高升的仇和，一个是因为陕西神木模式而明升暗降的县委书记郭宝成。玛雅问道：支持全民免费医疗，在学界、政界的“市场派”看来，这是逆天之举吗？李玲教授答道：

全民免费医疗是社会主义国家创立的。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给老百姓提供免费医疗，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做不到？这不是能不能做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做的问题。当初郭宝成在神木进行医改，财政部有官员质疑他，怎么能免费呢？全民免费是兜不住的。可是神木做到了，人均300元，县委书记和普通农民待遇一样。郭宝成说，经济发展了，政府有钱了，不就是给老百姓谋福利吗？所以，能不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关键就看“一把手”是不是真的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心上。可是这样的人最后成了“烈士”，为什么？（《文化纵横》2015年第四期）

为什么？说到底，还是为什么人的问题。群众路线说来说去无非一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如我们的国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样，旧中国疫病防控走精英路线，归根结底也在于此。1934年，国难当头，民不聊生，而蒋介石却搞起一个提倡礼义廉耻的“新生活运动”，南京国民政府为此发布的《新生活须知》，对衣食住行规定得不厌其详，包括种痘防疫等条款：饮具须净，食物须洁；饮嚼无声，座必正席；饭屑骨刺，毋使狼藉。黎明即起，漱口刷牙；剪甲理发，沐浴勤加。厨房厕所，尤须净扫；捕鼠灭蝇，通沟清道。和洽邻里，同谋公益；互救灾难，种痘防疫……看到这些具文，怎不恍若隔世，不知今夕何夕。王树增在新作《抗日战争》中写道：“连年的自然灾害、军阀混战以及日本入侵引发的战乱，令这片国土上的难民和流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由于贫富差距的巨大以及社会不公的加重，占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常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苦难深重中的百姓怎么可能做到食具要干净，物品要排齐，走路胸部要挺出，衬衣要常洗，头发不超过二寸？”当然，又怎么可能“厨房厕所，尤须净扫”“互救灾难，种痘防疫”，当时所谓的健康传播即使用心良苦，也是既难健康，也难传播。

关于健康与社会，刘娟的论文作了有说服力的传播考察，而玛雅、李玲对访谈

又作了富有启发性的社会分析。所以，读刘娟的著述，获得一种历史的澄明；读玛雅与李玲的访谈，又获得一种现实的反思。

是为序。

李 彬

2015 年于清华园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001
第一节 选题缘起	001
第二节 文献回顾	003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方法	017
第二章 缘起：近代重庆的社会变迁与疫病流行	021
第一节 开埠：长江上游的内陆口岸城市	022
第二节 建市到迁都：中心地位日益凸显	028
第三节 人口流动与疫病风险	030
第三章 结构：建设中的近代重庆防疫体系	038
第一节 卫生行政：精英阶层的救国尝试	038
第二节 近代重庆医政体系的建立	044
第三节 种痘条例：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规制	046
第四章 规训：学校教育与社会运动	053
第一节 学校教育	054
第二节 新生活运动：顶层设计的“群众”运动	059
第五章 传播：天花防控观念的创新扩散	069
第一节 种痘及防疫书籍	070
第二节 医学期刊及报纸副刊	074
第三节 插图及海报	077
第四节 人际途径	082
第五节 其他形式	086
第六节 传播特点及效用	089

第六章 图景：重庆开埠以来的天花防控实践	090
第一节 施种：从个人行为到专业机构	090
第二节 受种：由点到面的全民参与	094
第三节 困境与突围	096
第四节 防疫效果	101
第七章 结论与余论	103
第一节 重庆的天花灭绝实践	103
第二节 国共政府卫生工作之差异	107
第三节 疫病防治、健康传播与社会	114
第四节 研究局限	119
参考书目	120
附录 A 通商口岸估计华人洋人丁数（1891—1912 年）	137
附录 B 重庆口岸进出口人口数（1891—1919 年）	138
附录 C 1912—1936 年全国主要传染病流行情况	140
附录 D 《种痘条例》（1928 年）（民国十七年公布）	143
附录 E 省市种痘传习所章程（1929 年）（民国十八年公布）	144
附录 F 《普遍春季种痘办法》（1935 年）（民国二十四年公布）	146
附录 G 《种痘条例》（1944 年）（民国三十三年公布）	147
附录 H 《各机关学校工厂团体种痘办法》	148
附录 I 磁器口青年服务社诊疗所主办牛痘播种运动实施办法	149
附录 J 重庆地区疫病大事记（1903—1949 年）	150
后 记	154

第一节 选题缘起

“生老病死”是关涉人类的永恒命题，佛教称之为“人生四苦”。受知识水平和宗教迷信的影响，中国古代有六气（阴阳、风雨、晦阴）致病的学说；西方，中世纪以来，则认为疾病具有道德劝谕和惩罚的隐喻，人类内心深处的各种恐惧都与之相关。瑞典的病理学家韩森（Folke Henschen）曾说：“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①而纵观人类文明史，疫病又毫无疑问是人类生存的头号敌人。从公元6世纪出现的“查士丁尼瘟疫”、14世纪的黑死病，到16世纪欧洲泛滥的鼠疫、17—18世纪世界流行的天花和1918年在美国暴发的“西班牙流感”，这些流行性传染病夺走了数以亿计的生命，在不同时期影响了文明的进程，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恐慌和哀伤。直到今天，肺结核、艾滋病等疫病仍像暗中潜伏的幽灵，时刻威胁着我们的健康。

近代科学出现之前，人类只能任由疫病肆虐，无计可施。现存的大量文学作品和神话传说，记录了瘟疫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留下的深刻印记。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魔盒和俄狄浦斯的故事，将疾病赋予社会学的意义，隐喻人类为自身罪行所遭受的惩罚^[2]；薄伽丘（Boccaccio）的《十日谈》以14世纪著名的“黑死病”为背景，讲述了瘟疫流行时的世态万象^[3]；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加缪（Camus）和

① The history of mankind is the history of its disease.

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Saramago）的小说《鼠疫》^[4]和《失明症漫记》^[5]，则赋予瘟疫寓言的意义，在人力不可抗的恐惧中重新审视人性和社会制度；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ia Márquez）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跨越半个世纪的岁月，主人公历经了爱情的种种可能，因其交错瘟疫、时光及人性的复杂背景，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6]。

由于缺乏科学的解释，围绕疾病展开的宗教仪式和民俗成为不同时期人类文明中共享的历史印记。直到 1865 年，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 年）提出微生物是导致瘟疫的病因，并将之称为“病毒”，才使得人类真正摆脱了长期对瘟疫近乎无知的状况，开始运用科学的手段应对瘟疫。1928 年，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 1881—1955 年）发明了青霉素（Penicillin），使人类对抗瘟疫的手段有了质的飞跃。19 世纪以来，随着免疫科学的不断发展、医疗条件的持续改善和各国公共卫生制度的建立，传染病的致死率持续下降，一时间瘟疫吞噬数千万人生命的时代几乎已经终结，但“疾病与人类的关系依然存在，并将继续与人类长久共存”^[7]。进入 21 世纪，短短十年间，来势汹汹的流行疾病几乎已经成为地球的常客：2003 年美国疯牛病（BSE）、中国“非典”（SARS）；2004 年安哥拉马尔堡出血热（Marburg）；2007 年刚果埃博拉出血热（Ebola）；2008 年巴西登革热（Dengue Fever）、津巴布韦霍乱（Cholera）；2009 年中国的手足口病（HFMD）和 2013 年中国暴发的 H7N9 禽流感……疫病像是大自然的自我规制和能量平衡，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面貌出现，警示人类自身能力的局限，提醒我们尊重地球上共存的其他生物。

《逼近的瘟疫》（*The Coming Plague: Newly Emerging Diseases in a World Out of Balance*）^[8]是美国记者劳里·加勒特（Laurie Garrett）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出版的长篇纪实作品，作者以其公共卫生的学科背景和新闻记者的职业视野描述出一个让人沮丧但不得不正视的主题：人类在与瘟疫的战争中打了败仗。在 2008 年的中文版自序中，作者称，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控制流行病的传播对信息公开透明的要求显得更加迫切。各国的科学家和政治领导人都在研究如何互通信息，快速采取公共卫生措施，使世界免受毁灭性流行病的破坏。审视信息传播对于公共卫生与全民健康的价值，是本书的出发点，亦是研究健康传播对于应对疫病防治的现实意义。